

# 世界悲剧通史

谢柏梁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世界悲剧通史

谢柏梁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悲剧通史 / 谢柏梁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325 - 6780 - 5

I. ①世… II. ①谢… III. ①悲剧—戏剧史—世界  
IV. ①J80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9619 号

## 世界悲剧通史

谢柏梁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金坛市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43.75 插页 5 字数 852,000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500

ISBN 978 - 7 - 5325 - 6780 - 5

J · 436 精装定价: 1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 序 一

徐中玉

发表一篇论文相对容易,出版一部有些独创意义的著作殊大不易;出版一部著作相对容易,但是推出一整套悲剧史学与美学书系殊大不易。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北京市特聘教授谢柏梁知难而进,常年在悲剧学领域内辛勤耕耘,终于推出了《世界悲剧通史》、《中国悲剧文学史》和《中国悲剧美学史》等一组中外悲剧史学书系。

在《世界悲剧通史》等中外悲剧史书系即将面世之际,作者一定要我说几句话。谢柏梁是我三十年前的研究生,我对他本人以及这本书的情况所知较多,借此机会可以做些介绍。

柏梁在中外悲剧史、戏剧理论史和当代戏剧史方面,近些年已经出版了一些著作。《中国悲剧史纲》、《世界悲剧文学史》、《世界古典悲剧史》、《世界近代悲剧史》、《中华戏曲文化学》等书出版后,较受读者欢迎,得到学界好评。现在北京市教委、中国戏曲学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柏梁的悲剧学书系集萃出版,这都是社会上对做出了一定成绩的中年学者的热心扶植。

柏梁出生在湖北天门市的一个书香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曾当过教师。天门古称竟陵,紧邻屈原行吟的楚国都城郢都。唐代茶圣陆羽、诗人皮日休和明代文学家钟惺、谭元春,都是竟陵人,所以这一带着悠远的文化传统。柏梁从小就养成了“敬惜字纸”、“开卷有益”的崇文心理,对知识、文化与学问抱有一种特殊尊爱的感情。

对传统价值观念和学术文化事业抱有终生信仰并非容易。这些年来,柏梁的不少同学都已跻身于老板、经理行列,经济收入颇为可观;从政的一些同学,也都有着较好的发展。他本人身处闹市长街中,依然能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坐得稳冷板凳,努

力治学，殊为不易。

从读研究生时期起，柏梁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一些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近年来，他出版了好几部戏剧专门史，合起来看可望构成自己的戏剧文化史系列。

我对于他的庞大计划，一则以喜，但也曾有过担忧。个人精力有限，不能太辛苦、太焦急。柏梁却能够劳逸结合，注意身心的调节和工作的节奏。他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写下来，三十年来积少成多，写出了数本较有分量的戏剧专史，尤其是悲剧史，这是很难得的劳动收获。

做学问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重在小处着眼，做微观的探究；另一种重在大处着眼，做宏观的把握。柏梁显然偏向于后一种，所做的都是一些中型规模以上的专门题目。这些题目应有其独创性，具备一定的开拓意义；同时也应有微观探究作基础，因而颇具备难度，分外艰辛。大凡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拓荒者先行一步，后来者才能日臻完善。前者与后者的共同努力，才能使学术扎实、事业兴旺。拓荒者的精神很可贵，柏梁就能勇于拓荒。

当今社会安定、科研基金稳定，都是支撑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柏梁也善于争取社会的支持，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得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先后两项基金项目、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市“曙光工程基金”、市新闻出版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青年教师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专项基金、北京市特聘教授、北京市教学名师与领军人才等许多方面的项目资助。天道酬勤，社会各方面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希望他加倍精进。

大家的支持对柏梁既是压力，亦是压力。好在柏梁从小生活艰苦，初中毕业就失学6年。这期间当过农民，做过码头工，在生活的底层养成了顽强的毅力。他通过刻苦自学，连续考了三年大学，这才得以走进高等学府深造十年。艰难困苦，玉汝其成。柏梁能够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绩，按时完成各级科研资助部门下达的研究计划，并将研究成果在京、沪、台等地的出版社付梓行世，这都与他在少年时代形成的敢于吃苦的精神密不可分。他早在30多岁就获得高级职称，成为较为年轻的教授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决不是偶然的事件。我曾是他的导师，理应向他表示祝贺，同时也深感欣慰。

## 二

1983年，柏梁应考我和齐森华教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当年的考生比较多，学养都不错，我给他们出的试题有一定难度，期待他们的起点较高、视野较广，同时也能看出他们的学术基础、悟解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记得有一道

题目的大意是问：“中国古代文论有何特点，中西文论如何进行比较，古文论应该怎样发扬光大？”这一题目较大，可能看出考生的有关史论常识、知识储备情况、思辨训练情况以及宏观分析水平。柏梁回答得不错。连他在内，这一届择优录取了三名研究生，另外两位是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的谭帆和陆炜。他们分别来自湖北、上海和南京，碰巧都对戏剧理论比较感兴趣。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与交流，他们三人都决定在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化的大背景下，重点研究古代戏曲理论的发展过程。

我自己对曲论并无专门研究，只能同他们一起就研究的目的、方法与程序等最基本的方面入手，要求他们在积累并占有相当资料的基础上，逐步具有关于中国曲论的基本观念。我们共同精读、讨论了若干古今理论名著，各自明确了自己准备主攻的课题，然后便要求尽可能从最重要的创作和研究专著中去大量搜集资料，并用原文复印、卡片制作和笔记抄录等方式日积月累，逐步拥有具备自己特色而又较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一边是材料的积累，一边是观念的拓展。我们用定期集会、共同讨论的方式，就各自最近接触、思考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以使自己的认识思路明晰起来。由他们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共同讨论、相互补充。我也是参加讨论的一分子，在参与他们讨论的过程中亦增加了不少知识。我主张经过讨论，大家尽可保留各自的意见；只要言之有据、论之成理，就可以写到以后的硕士论文中去，完全不必受我发言的约束。

就这样，柏梁他们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每隔两个礼拜就要来到我的书房切磋半天，互通学习情况。三人中，柏梁年龄稍小，写东西很快，文字比较活泼，也勇于发言。由于他没有读过高中，又有一段黄金时间是在社会上务农做工，体验过一些人生的艰辛，但却对文化知识矢志追求。他有着较强的悟性，反应敏捷，思维活跃，又非常勤奋于习作，所以进步相当快。

针对其具体情况，我要求柏梁多积累资料，先把基础打扎实；除了规定应写的学习报告外，暂时不要写杂七杂八的其他文章，以免分散精力。在上课时，我介绍了自己求学时如何接受老师们的指导，得以积累下几万张古代文论研究资料卡片的方法与体会，告诉他们下苦功是极其必要的。柏梁至少有三年之久，泡在图书馆积累资料，同时也积极参加了我所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的部分工作。我还给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以及其他熟识的师友们写信，介绍柏梁分别到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藏书较丰的地方去查阅珍本、扩大视野。柏梁就这样成年累月地在京沪等地的图书馆查书、看书、抄书，较为完整地誊录了大量古代戏曲序跋，并写成了一部《中国古代戏曲序跋汇释》。硕士论文就用《中国古代戏曲序跋概论》的题目写成。由于资料掌握得比较多，辨析力也提高较快，学位论文写得相当丰厚。他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较早地论述到戏曲序跋中所蕴涵的大量文论资料及其意义。

戏曲序跋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只是一个个案。柏梁由此出发,亲身经历了学术研究从选择课题出发、经过广泛深入的第一手材料的占有,以后才能站在高处予以立论这一基本程序。只有经过了搜集材料阶段的艰苦,才能获得后期可能感到的明白酣畅。他后来广泛涉足于戏剧理论、当代戏剧、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等不同领域,都是这样起步的。

柏梁在华东师范大学主要学习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和戏曲理论。对文论曲论有一定了解后,很自然就会与文学史和戏曲史的具体创作联系起来看问题,这正是我一直提倡的研究方法。当我了解到柏梁有志于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就推荐他到与我有师友深谊的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那里去攻读中国戏曲史博士学位,这一去又是三年。在这三年里,他又得到了各方面的更多帮助,学业更加精进。

取得博士学位后,柏梁对我谈过他在中国悲剧史方面的许多见解,很有新意。他亦谈到,这些年就案头戏剧论中国戏剧、就中国戏曲论中国文化,还存在着与舞台演出相隔甚远、与话剧电影和西方文艺隔膜较多的一些困难。这方面的各种条件,可能在上海更方便一些。我也向上海戏剧学院余秋雨教授等人介绍了柏梁的情况,很高兴得到学院支持,于是他又回到上海来了。

上海戏剧学院多年来一直以讲授、研究并上演世界各国经典名剧为特色,在国内外的演艺界夙著声望。在经历了湖北师院、华东师大和中山大学三个中文系不同情况的学习后,柏梁又得以在专门的戏剧学院担任具体教学工作,得到许多观摩实践的机会,了解舞台演出的全过程,对西方戏剧有了更多的学习和借鉴的可能。戏剧学院在中外戏剧影视方面有着最为集中而丰厚的书报杂志和音像资料,拥有长年排练并演出西方戏剧的艺术氛围。柏梁过去一直是从案头文献方面对中国戏剧进行平面研究,现在有机会从场上演出方面对戏剧呈现的全过程予以立体把握,能够将文学层面与艺术层面叠映起来看待,更有可能将较为纯粹的中国戏曲研究扩展到对西方戏剧的比较研究上去。

国际戏剧界与戏剧学院的多方面联系,同样给柏梁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新的视野。学院曾派柏梁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讲授中国戏曲,美国学术委员会也曾邀请他到美国大学中去讲学研修,这都使他得到了与北美戏剧界专家们当面切磋、互通讯息的便利,更具备了查阅有关西方悲剧学发展之文献资讯的基本条件。柏梁还曾应澳门基金会的邀请,到澳门大学讲学并查阅欧洲戏剧特别是南欧戏剧方面的文献。他之所以能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外国戏剧名家名著的范畴中去,这与他在域外学术界的见闻也大有关系。

正因为柏梁有着上述这样一些游学、治学较为优越的具体条件,加上他个人的很大努力和特别勤奋,才写出了《世界悲剧通史》这样的著作。我一直赞成求学、治学和讲学要有适当的流动性,目前较为普遍存在着的学术界近亲繁殖的现象,恐怕还是有

着某些弊端的。杜甫所说“转益多师是汝师”的求学方法值得重视。柏梁面前的学术之路还很长,还应谦虚谨慎、精益求精、永不自满。希望进一步做到兼收并蓄、择善而从、不断努力、勇于创新。

### 三

柏梁的《世界悲剧通史》,大致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这是一部涵盖了世界上诸多戏剧大国在悲剧文学方面的发展概貌的通史。

悲剧艺术是戏剧当中最富于感染力和文学性的体式,主要反映出人类在天灾人祸降临头上的誓死抗争,以及在这种抗争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坚强意志、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和博大的品格。

柏梁的中外悲剧书系,在选题上有着一定的开拓意义。汇总到《世界悲剧通史》里头,不同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可以汇集成悲剧发展的世界大观。悲剧学问题本身很复杂,读者需要也较广泛,有关这一专题的学术研究也应该是千姿百态的。微观研究、断代研究、国别研究和总体研究都非常重要。总要有人来广采博纳,长袖善舞,来做一些总体性较强的整合研究。柏梁的著作,就具备开拓精神和总览意义。

此书溯源古巴比伦、古埃及的文明萌芽形态,着重对古代希腊、罗马和印度的早期悲剧予以了浓墨重彩的勾勒,又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欧洲悲剧、13世纪以来的亚洲悲剧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描摹,并且在此前提之上作了一些归纳、比较和理论升华。我曾对柏梁从事类似世界悲剧通史这样大的课题表示过担心。这样的研究,涉及的国家、地区和种族是那么多,语言的隔阂较大、材料亦难于足够掌握和占有。但在看到他的这个成果之后,觉得他是尽了大力,做出了成绩的。

其次,《世界悲剧文学史》将东方悲剧汇入了世界悲剧演进的主流。

早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古希腊悲剧就已经发育得相当完善。相当一批悲剧家们拱卫着三大悲剧家的矗立,悲剧竞赛活动成为全民参与的盛典。由此衍生出来的西方悲剧蔚为大观,成为西方文艺中的重要部类。相形之下,东方戏剧是否有悲剧、这些悲剧是否正宗,以及东方悲剧在世界上是否也能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学术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悲剧只是西方的专利,东方没有正宗的悲剧,甚至连“悲剧”这一翻译用语是否准确都成为问题。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印度、中国和日本等东方国家确实有着自己的悲剧,这些悲剧必然带有浓厚的东方特色和民族性,但在总体上仍然可以同国际间通行的基本悲剧观念联接。

20世纪初叶时,我国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明确指出,元代悲剧“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



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季思在20世纪末叶选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也得到了学界和社会上大多数读者的基本认同。

柏梁在前人的基础上,不仅将西方悲剧的源头追溯到古老的东方悲剧文化,还将东方悲剧中的一些名家精品与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悲剧相互呼应。书中不仅是对东西方悲剧的简单排列,还注意到从全球悲剧发展的先后相承和彼此互补方面看问题。比方书中提到的为什么古希腊罗马悲剧几乎有千年光景后继无人,而在遥远的东方却接力赛跑般地出现了包含悲剧在内的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希腊悲剧、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究竟有无文化上的血缘关系,这些问题的提出值得人们深思。将东方悲剧如实归入国际间各国悲剧之列,能使一部世界悲剧发展史显得更为公允、扎实而客观。

第三,《世界悲剧文学史》的问世,可以促使人们思考关于是否存在中国悲剧特色的问题。

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学者们无论是否承认中国有悲剧,都对悲剧问题十分关注并充满了探讨热情,当时报章上的诸多论战也不在少数。在大学课堂里,悲剧问题也成为文艺理论等课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1936年我在山东大学读大三时,就在叶石荪教授所讲《文学批评原理》和《文艺心理学》两门课程中听到悲剧问题。洪深教授曾让我做他排演《寄生草》的助手,他也在导演过程中常提到这一类命题。老舍先生在山东大学时讲授外国文学和写作课程,也促使我更多地关心小说和戏剧的一些理论话题;他在重庆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时,也继续对我写文章、编报章予以了认真而细心的指导。在胡适之先生所编的刊物上,我也发表过文章。陆侃如、冯沅君二位教授,双双从法国巴黎研究院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回来。

山大的冯沅君教授既是冯友兰先生的妹妹,更是很有名气的女作家(笔名淦女士),也是非常权威的诗歌与戏曲研究专家。她的《古优解》、《古剧说汇》等书,是研究中国戏曲必须重视的著作。她还指导过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所以当年我们山大的学生,对戏剧也具备一定的了解和兴趣。后来我到中山大学读研究院,对戏剧就接触得少了。

尽管关于西方悲剧偏于严肃和崇高、东方戏剧缺少这些基调的说法不少,但这只是一部分西方学者及其赞成者们的观点。东方学者对东方悲剧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东西方文化本身存在着差异,古代悲剧的差异当然也很明显。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差异可能会逐步减少乃至融合,这是今后可以预期到的趋势。如果说要求中国古典悲剧的标准和特点应与西方悲剧完全一样,那岂不是要求我们削足适履?

借鉴西方悲剧理论,联系我国戏剧实际情况来考虑中国悲剧问题,自觉地探讨悲剧的基本理论及其在戏曲解读过程中的具体运用,自觉地将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进行

比较,自觉地在我国大量翻译并上演许多西方经典悲剧,这都是 20 世纪才出现的新鲜事。中国的悲剧及其理论归纳,不可能不具备浓厚的中国特色。在世界各国林林总总关于悲剧问题的不同思索中,中国的悲剧及其理论思考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挖掘、认真研究的学术文化问题。

改革开放的这些年来,我国的学术文化环境有所改善,柏梁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都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这是我国文化的一大转机,使得勤奋努力的学人们看到了光明前景,更加增添了前进的动力和信心。社会大环境的清朗平和,具体工作条件的改善和个人的自觉努力,以及具有高尚的理想与永不自满的品格,这些因素如能综合起来,就能为人才的涌现提供坚实的基础。

衷心希望现在作为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和国际剧评协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兼副会长的谢柏梁,能以已经取得的成绩作为基础,再接再厉,不惮艰辛,切切实实地为建立中国的悲剧文化史学、世界悲剧通史与悲剧学通论等分支学科,为共同繁荣我国的戏剧艺术事业和学术文化事业,为比较戏剧和比较文学的相关课题,做出更多有价值的贡献。中国的戏剧理论界和文艺理论界需要拥有中国特色、自成体系而不是纯粹欧化的话语系统,我也期望包括柏梁在内的中青年学者们,能逐步融入到国际学术界的主流中去,从而渐渐获得中国学者相应的学术话语权。

(该序作者为全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原中系主任,著名教授)

## 序 二

余秋雨

1988年,我到广州话剧团担任白先勇先生话剧版《游园惊梦》的文学顾问,期间曾经接受邀请,到我国戏曲研究的学术重镇中山大学中文系举办过学术讲座。在中大,我主要就傩戏和各地地方戏的田野考察话题、就世界上主要演剧流派等话题,与王季思先生、黄天骥先生及其弟子们有过愉快的交流。

座中诸人中,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考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的谢柏梁,是位努力用功的学子。他在我的讲座之后,谈及对海派文化的眷恋之意,也提出毕业后想回到上海工作。华东师范大学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徐中玉教授、中文系主任齐森华教授,都是谢柏梁的硕士生导师,他们也向我打过招呼。作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我与戏文系主任丁罗男教授商量,十分高兴地接受谢柏梁到上海戏剧学院任教。于是,柏梁就成为到上戏任教的第二位博士。

在上戏任教期间,谢柏梁博士的《中国悲剧史纲》、《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和《中国分类戏曲学史纲》等专著在上海学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所资助的《世界悲剧文学史》又写了出来(该书为《世界悲剧通史》的古典部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曾获得上海戏剧学院科研一等奖、全国外国文学学会与国家新闻出版总局颁发的外国文学优秀研究著作奖)。他如此年轻又如此勤奋,已经使我阅读的速度都跟不上了。好些日子前他就希望我能为他的新著写一篇序,我想,写一篇序言比他写一本书还慢,实在太说不过去了。那么,就容我降低要求,借序言的篇页谈几句我对悲剧研究的看法吧。

我想,任何研究悲剧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做的是一件真正的大事。在多数情况下,悲剧是一种群体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属于人类最基本、最重大的几项体验之一,因此跨国界而涉中西,历时态而贯古今。有时,人们愿意把这种体验集中在剧场

里,通过审美触因来激发和完成,这就成了戏剧范畴内的悲剧。由此可见,即便是戏剧范畴内的悲剧也不能仅仅从表层技法上来考察,那只不过是人类学和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的一种特殊呈现方式罢了。

在古代,悲剧表现为一种激情;在近代,悲剧表现为一种自省。悲剧的激情是人类与自然搏斗、与命运周旋、与邪恶较量中的强力震慑,以及震慑后的两难和两难中的净化;悲剧的自省是民族和个人对自身存在状态和内心异质的突然发现,以及发现后的清醒,清醒后的无奈、疯狂或自谑。其实,悲剧的激情和悲剧的自省是互相交糅的,最终表现为对人类存在本身的接受和体认、一种无法接受后的终于接受、难于体认后的深刻体认。从这种观点来看,研究悲剧,其实是在至深层次上研究人类。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人认真地研究悲剧,那么或迟或早,他会因自身的轻巧而浅薄,而陷入真正可怕的悲剧情境中去。

正因为悲剧与人类的处境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其从内涵到形态也必然会随着人类的前进而不断变化。传统的悲剧观念已经是千变万化的了,而今天人类的悲剧体验更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这还不算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和民族在这问题上的严重差别呢。凡此种种,都给悲剧研究带来了特殊的难度。

据我所知,国际学术界不少学者一直乐此不疲地做着这项既烦难又重要的工作,出版了大量研究著作和资料汇编,而我们国家系统做这件事的人却不多。因此,我认为谢柏梁博士的工作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至少可以为人们进一步的思考奠定一个历史框架与基本脉络。悲剧史学也是悲剧美学的前期基础工程之一。但愿多少年后,我们周围文化界的人士对悲剧的谈论不再那么狭隘,那么琐碎,与国际学术界有那么大的距离。如前所述,这种企盼首先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我们民族在基本生存状态上的清醒和自觉。

(该序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著名作家和戏剧理论家)

### 序 三

## 悲剧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

江曾培

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担任社长和总编辑时，每年都会接到一些学术意义比较大、科研质量比较高的书稿，这是作为一位出版人最为欣喜高兴的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曾经出过谢柏梁的博士生导师王季思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这两部书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曾成为当年读书人家所乐于收藏的好书。

当着勤恳负责的陆稼林编辑，将王季思先生所指导的博士、上海戏剧学院年轻的副教授谢柏梁的书稿《世界悲剧文学史》申报上来后，我真是眼睛一亮。陆稼林编辑早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他对戏剧的了解和把握很专业。谢柏梁又是当年在上海戏剧学院执教的两位博士之一，而且他的书稿又是1991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资助的一项科研课题，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级科研成果。这样的好书，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然要支持出版。后来上海新闻出版局也同意我们的看法，他们也给予了一定的出版基金资助。这样，《世界悲剧文学史》才得以精装本和平装本两种面貌出版问世。

数十万字的《世界悲剧文学史》出版之后，在国家社科规划基金所组织的专家评审鉴定会上，该书被认为是一项富有开拓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因为，悲、喜剧之分，原本属于西方传统的美学范畴。中国古代戏曲的分类，一般以题材或角色行当而定。历代的文论，很少出现悲剧、喜剧的概念。20世纪初，在一些企图沟通中西方文化的学者中，曾引起中国有没有悲剧的争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争论后来未能深入展开。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与王季思先生策划编选《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时，就组织一些专家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将其中一些文字，结集出版为《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谢柏梁先生在此基础上起步，以博大的视野、丰富的资料，对中国悲剧、亚洲悲剧乃至全球悲剧予以广阔的覆盖与全面的

分析,从而把这一问题的研究系统地向前推进一步,使之成为成了迄今为止的第一部包括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在内的世界范围的悲剧史著作。

参加评鉴审定以后,我在想,那些认为悲剧只是西方概念,不能用以衡量中国戏曲的看法,似乎忽视了人类与人类文化有着许多共同的、相通的地方。谢柏梁写道:“文明之源的根本动力,是对生命、社会和宇宙的不断探索。求索过程中美好愿望与严峻现实的必然反差,构成人类生存状态中饱含生机的危机。”这就使人类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具有悲剧性的冲突。中国古典戏曲《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等,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冲突。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就可以成为衡量古今中外一切悲剧作品的共同尺度。因此,对这个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悲剧概念,就不必拒绝借鉴,应以“求同”的心态,“拿来”为我所用。

当然,不同国家的文化,又有着自己特有的发展轨迹。悲剧理论的基本原则,虽然具有普泛性,但它毕竟是从西方的戏剧创作与演出中总结出来的,其具体内容与阐述,就难以完全适用于东方,适用于中国。比如,西方悲剧的主角一般都是帝王将相,我国悲剧的主角则大多系普通百姓。对此,就不宜用西方的悲剧学说生搬硬套,而应从中国社会的、文化的实际状况出发,研究出中国悲剧的特征与特色。在这里,我们就又不能满足于“求同”,而应该进而“求异”。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谢柏梁博士研究的可贵,也在于他对东西方悲剧作了真的对照与比较,探索了它们的“同”中之“异”。

《世界悲剧文学史》出版之后,得到了出版界和学术界较高的评价。1998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外国文学学会曾给予该书以第三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研究著作奖。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的外国文学专家组对该书评价也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上海外国语学院胡孟浩院长,复旦大学外语系主任夏仲翼先生,都先后找谢柏梁表示祝贺,同时也希望谢柏梁在此基础上,再继续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再写一部《世界近代悲剧史》。

谢柏梁博士在高人的指点之下,又将《世界近现代悲剧史》作为新的项目报上去,又得到了国家社科规划基金的支持,终于在2005年得以完成结项。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支持,使得谢柏梁形成了《世界古典悲剧史》和《世界近代悲剧史》两部书,并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袂出版。

从谢柏梁1986年开始写作《中国悲剧史纲》博士论文开始,二十多年过去了,谢柏梁从上海戏剧学院的年轻学者,成长为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主任,后来又成为北京市特聘教授、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国际戏剧家评论学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他也先后在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各国讲学、访学,收集材料。在上海交通大学担任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的时候,他又指导了一批从事外国戏剧研究的弟子。如今,他又把那么多年关于中国戏剧和外国戏剧的成果丰富集中起来,在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世界悲剧通史》一书。作为最早参与谢柏梁悲剧文学史著作编辑出版的老朋友,谨向他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表示祝贺,希望这部较成规模的《世界悲剧通史》能够在学科发展上起到铺垫基础、积淀文化的作用,能够继续推进中国悲剧学和世界悲剧学的长足发展。

现在看来,中国悲剧史不能孤立于世界而存在,世界悲剧通史同样也离不开中国悲剧发展的相应篇幅。作为学术文化的一个整体性学科,悲剧理论不仅仅属于泱泱世界,同样也属于古老而年轻的中国。

(本序作者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前社长兼总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

序一 .....	徐中玉/1
序二 .....	余秋雨/8
序三 悲剧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 .....	江曾培/10
导 论 .....	1
第一章 上古东方悲剧雏形 .....	1
第一节 巴比伦悲剧史诗 .....	1
第二节 埃及各类悲剧体裁 .....	6
第三节 希伯来宗教悲剧 .....	11
第二章 古典希腊悲剧模范 .....	17
第一节 埃斯库罗斯的命运悲剧 .....	18
第二节 索福克勒斯的伦理悲剧 .....	23
第三节 欧里庇得斯的社会悲剧 .....	33
第三章 希腊悲剧理论经典 .....	43
第一节 阿里斯托芬的悲剧批评 .....	44
第二节 柏拉图的悲剧美学 .....	48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 .....	54
第四章 中罗抒情悲怨剧诗 .....	62
第一节 屈原的骚体剧诗 .....	63



第二节 塞内加的书斋悲剧·····	69
<b>第五章 东西古典悲怨美学</b> ·····	76
第一节 中国怨谱的美典丽则·····	76
第二节 罗马悲剧的金科玉律·····	84
第三节 梵剧悲音的妙味奇情·····	92
<b>第六章 印度梵语悲剧遗产</b> ·····	98
第一节 跋娑的国难联姻悲剧·····	100
第二节 迦梨陀娑的仙人想恋悲剧·····	106
第三节 戒日王的舍身证法悲剧·····	113
<b>第七章 中国元代悲剧楷模</b> ·····	120
第一节 激越凌厉的复仇悲剧·····	121
第二节 缠绵凄惶的苦恋悲剧·····	138
第三节 苦恼人生的情理悲剧·····	150
<b>第八章 日本能乐悲剧精品</b> ·····	159
第一节 世阿弥的谣曲创作·····	160
第二节 世阿弥的《风姿花传》·····	174
<b>第九章 晚明清初四大悲剧</b> ·····	187
第一节 史诗悲剧《浣纱记》·····	188
第二节 性爱悲剧《娇红记》·····	196
第三节 离合悲剧《长生殿》·····	202
第四节 兴亡悲剧《桃花扇》·····	211
<b>第十章 怨谱苦戏悲剧观念</b> ·····	220
第一节 唐宋元代怨苦端绪·····	221
第二节 明代戏曲怨谱学说·····	224
第三节 清代苦戏悲剧源流·····	230
<b>第十一章 莎士比亚悲剧奇葩</b> ·····	235
第一节 莎士比亚的政治悲剧·····	236